本书是作者罗志田的论文集，收录了与近代中国思想社会巨变相关的几篇文字。或许本书的文字尚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水平，这里只就本书所体现的特点来评价，未必准确。作者写作的风格，喜大量引用学者、经历者之言论以作论据，但缺乏史料的探索、分析，从中基本看不出考证的工夫。其次，作者的分析可能也正是由于缺少第一手史料的支撑（并不总是如此，如《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》就完全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上的研究），读起来总不免感觉飘在空中，不着实地。至于史学的洞察力与创见，本书中未有令笔者读来眼前一亮之处。看来，师父与弟子之差距不仅在研究的广度上，深度亦相距悬殊。不过值得宽慰的是，作者毕竟有所师承，眼界已经跳脱除了大陆常有的“教条主义”，总不必犯那些“人云亦云”之缪。笔者也认同作者在前言中的观点，费正清的“冲击-回应”说仍旧是有相当道理的。

下面试举几例以做观察。在《新的崇拜：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》中，作者分析的角度基本是站在“冲击”的一面，即只注意那些西方思想对中国造成的冲击，中国学者如何表达“新的崇拜”。但是，就笔者所了解，这一时期同样有一种重要的趋势，即试图调和中西文化，所谓“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”孙中山的“三民主义”是政治上的代表，即使是胡适，也未曾完全赞同“全面西化”的说法。按照余英时的说法，“五四运动”不能看成就是反传统、反儒教的运动，“五四”的积极参与者中有不少人都是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。因此，作者在本文中不免只偏于一端，未见全貌，则其分析总归有所缺失。

再者，本书中的多篇文章中，作者都使用了“士大夫”这一概念。且认为，随着科举制度的终结，士大夫就彻底丧失了社会来源，这一群体从此开始走入历史。但笔者以为，作者在这里对“士”的含义做了窄化。“士”并不与科举完全绑定，科举之前也有士的存在，通过科举者也未必就是士。“士”具有一种独特地文化背景，只要中国之“天下”未曾亡，则“士”就有其存在的空间。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，在这里不能详细地展开。作者的看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学者的观点，但并不正确，或者说仅仅在狭义上是成立的。

可能是由于笔者先前对作者所写的的历史时期、社会现象有一定但不多的了解，本书未能提供太多的新见解。稍值一提的是，作者在前言中写道：

民初的一个吊诡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，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。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，在这一点上都相通。保存中国文化传统而须由外国人来提倡，正是典型的角色倒置。

类似的现象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出现过，这并不是一个孤例，背后反映着某种共通的原理。